

古代人如何防范假冒伪劣

我国古代的质量管理制度注重生产者责任和出售者诚信。春秋晚期就已出现“物勒工名”，即把制造者名字刻在器物上，以便于检验产品质量。生产者对质量负有最终责任，明确责任并保证对失责者能够追究，是保障质量安全的重要前提。战国中期之后，不仅把工匠的名字刻在产品上，而且还会铭刻铜器的制造机构、官职名和工长名。



物勒工名制度最初主要在官营作坊中实施，尤其是在官营兵器作坊中应用最广泛、监管最严格。之后，私营作坊和其他器物上也开始实施物勒工名。战国中晚期，吕不韦作为秦国相国，是兵器质量的最高监管人，故其名字在秦国兵器上出现的次数最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进一步在法律上规范化，使得物勒工名质量责任制成为权威性的常规制度。

在物勒工名发展过程中，一些广告用语也出现在相关器物上。西汉后期的四神纹铜镜上，常铸有“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遨四海”。同时，汉代铜镜上已经开始用印章、印记标明生产者的姓氏、姓名及产地，可视为商标的萌芽状态。五代永陵王建墓出土的圆形铜镜背面，铭有“炼形神冶，莹质良工，好珠出匣，似月停空”。唐代的一些瓷器上标有“卞家小口天下有名”“郑家小口天下第一”等字样。

北宋时期还产生了图文并茂的标识。当时，山东济南一家专造功夫细针的刘家针铺，设计制作了一枚以白兔为商品标志的、专门印刷商标的铜版。这枚白兔商标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方阴文横刻“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中间阳刻白兔儿图形，两侧竖刻阳文“认门前白兔儿为记”，下方刻有较长阳文附记。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枚完全意义上的商标。

此外，明代的“六必居”酱菜、“同仁堂”药品、“张小泉”剪刀等老字号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正是质量责任制度和品牌发展相得益彰的结果。

我国自古就提倡“诚工”和“诚贾”，所谓“小商道做事，中商道做市，大商道做人”。质量诚信制度要点在于防止价格欺骗和质量欺诈行为，在于质量和价格的吻合。由此，“三日听悔”等制度应运而生。

在我国古代，检验检疫手段总体上比较落后。为了防止出售者利用消费者不知情进行欺骗，唐朝规定马牛驴骡等交易必须立市券，并实行“三日听悔”制度。即三天内，买方发现马牛驴骡有病，卖方要无条件接受退货，否则就得受到鞭杖40下。当然，买方同样不可欺。如果出现不诚信，把无病说成有病，也要受到同样的处罚。

尽管强调责任和诚信，但假冒伪劣现象依然难以杜绝。为此，《宋刑统》规定，生产和出卖假冒伪劣物品，罪同偷盗；市官及州县官司知情不办，与造卖者同罪。

南宋时期曾发生过一起假药案件，贩假药者被判“勘杖六十，枷项本铺前，示众三日”。示众能够起到惩戒当事人、警示其他从业人员的作用，是早期曝光质量违法行为的重要方法。

据《解放日报》

蒋经国亲自部署 粉碎“台独联盟”

陈三兴，台湾高雄人，1956年进入高雄中学。他无心向学，却热衷于社会活动，组织了一个政治色彩偏独的组织“学进会”。

1958年7月，陈因搞会务活动太多误学，最终辍学。离校的那天，陈三兴将“学进会”更名为“台湾民主同盟”。随后，他的亲戚，曾犯案并坐过多年牢、对国民党政权极其痛恨的宋景松，加入了该组织。

1959年7月，宋景松、陈三兴与台中市一中的“自治互助会”和高雄市立中学的“亚细亚同盟”两个“台独”组织挂上了钩。12月，这几个组织正式合并为“台湾独立联盟”，并选举施明德、蔡财源二人为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

由于“台独联盟”组织严密，发展迅速，到1962年，心血来潮的“台独”分子们经常在聚会中高喊要大干一场，要与国民党政权拼个你死我活，要尽快实现“台湾独立”的目标。这一年秋，他们在高雄体育场举行的一次全体成员参加的秘密会议上，还提出要开展一个大行动，即在全台湾开展一次“台独”宣传活动，让全体民众认识“台独”，支持“台独”。

这帮“台独”分子正要开始行动时，当局就对他们采取行动了。原来，台湾当局的“调查局”特工早已盯住了陈三兴。

1962年5月，在蒋经国的亲自部署下，从5月8日至20日，“调查局”的数十名特工兵分多路，将“台独联盟”在各地的成员陆续逮捕。6月，该组织在军队中发展的一帮成员，也被捉拿归案。

3个月后，“台湾独立联盟”案中的25名主要嫌疑犯被分三批起诉。宋景松因是再犯，被首批起诉，并被判处死刑，几天后就押赴刑场处决。该组织的主要头目陈三兴、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其他案犯分别被判处2年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据《党史信息报》

明代中国在引进外国军事技术方面从不保守。到了16和17世纪，学习仿制西欧火器技术成为潮流。

在明朝最后的20多年里，西欧火器技术传入中国是由明朝政府主导的。朝廷与较多跟洋人打交道的广东、福建地方当局，都主动搜寻西欧新式火器样品，并积极引进通晓火炮制造技术的西洋人士，让他们参加和指导西洋新式火炮的制造。在徐光启、李之藻等著名科学家的推动下，明朝政府于1620年派人赴澳门向葡萄牙人购买首批西洋大炮，徐光启又奏请选拔铸炮工匠，聘请精通欧洲炮术的葡萄牙匠师指导制造与使用红夷炮。

这种新式火炮具有较高的技术要求，需要数理知识、实验和理论的指导，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编译西欧火器论著的高潮。穆尼阁的《西洋火器法》、何汝宾的《西洋火攻神器说》、孙元化的《西法神机》、汤若望与焦勛合作译述的《火



明末引进火器不保守

攻要》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种大规模、高层次的技术引进，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中国引进西方火器技术，从一开始的被动到后来逐渐主动，不仅引进样品，也引进相关的科学知识，并对这些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加以改进、创新，这一点与日本的做法颇为相似。而且中国做得比日本更深入、更全面，以至于

日本也积极从中国获取西洋军事技术著作的中译本，以及明人写的军事技术专著，作为他们深化认识西洋技术的知识来源。

一直到17世纪中叶，中国的火器技术并未落后于世界，仍然与西欧一同成为火器开发与改进力度最大的两个地区，也充当了世界其他地区获取先进火器技术的主要来源地。据《中国经营报》

蒋介石裁撤海军总司令部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将原属北洋政府的海军纳入势力范围，但他一直对这些不是嫡系的海军存有戒心，尤其对于陈绍宽等闽系海军所提统一全国海军、成立统帅机关海军部的要求持消极态度。

1931年，陈绍宽为海军部代部长兼江南造船所所长，为了扩大海军，决定扩建江南造船所，并建一所海军医院，遭到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反对。1938年，海军部改组为海军司令部，陈绍宽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划归军政部直辖。海军不仅经费和军需上处处受到何应钦、陈诚的掣肘，所请派的驻外武官人选和请派的留学生，军政部也基本上不予批准，海军部所属人员也经常调往黄埔系的训练团受训。

1945年5月，陈绍宽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参与制订《联合国宪章》。陈诚则将其麾下的海军陆战队第一独立旅拨给了王耀武。8月15日，日本宣

布投降后没几天，蒋介石下令在军政部之下另设一个海军处，由军政部部长陈诚兼任处长，调远在英国留学的周宪章回国出任副处长。

日本投降后，日军海军移交的军舰、设备器材成了国民党各方争抢的目标。日夜梦想恢复海军实力的陈绍宽急令福建的第二舰队司令李世甲兼任接收厦门日本海军专员，又急电亲信曾国晟从湖南辰溪赶去重庆，从速沿江接收敌伪舰船。

李世甲立即率部去厦门进行接收，但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已先派省保安纵队前往接收。双方互不相让，对峙达1个月之久。最后达成妥协，海军的接收范围，仅限于厦门的日海军机构。

厦门接收完毕，海军总司令部又令李世甲为接收台湾的台澎专员公署海军专员。10月20日晨，李世甲率领部分海军陆战队警卫队在台北教育公会堂设立了第二舰队司令部。随后，海

军陆战队主力也到达基隆。10月25日，台湾省主席陈仪、李世甲等9人在台北举行受降仪式。11月初，李世甲率部队渡海到澎湖列岛，接收马公、左营两海港后，海军总司令部发布李世甲为台澎要港司令，司令部设在左营，下辖台北、基隆、马公三个办事处和马公造船所。

11月中旬，蒋介石多次电令陈绍宽率“长治”舰赴山东阻击由海路前往东北的中共军队。陈绍宽则提出“参加内战，内疚殊大”，并借口舰只需修理和急需增拨油费为由，率“长治”舰视察台湾。蒋介石得知后颇为愤怒，下令裁撤海军总司令部，免去陈绍宽的海军总司令一职。

1946年6月，国民政府正式实行军事改制，取消军事委员会和军政部，设立国防部，把海军署重新扩编为海军总司令部，参谋总长陈诚兼任海军总司令，周宪章任海军参谋长。

据《人民政协报》

中共“四大”会址是如何找到的



郑超麟实地考察“中共四大”遗址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当时中央要求，开会地点不能在租界里，又不能离租界太远，以便一旦发生问题可立即撤退疏散，往租界跑。因此，会址选在了闸北淞沪铁路附近，北四川路西的华界与租界毗邻之地（即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这是一幢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比较隐蔽，不易被警探注意。会议在二楼举行，会场布置成教室模样作为掩护，三楼房间则作为部分代表的临时宿舍。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四大会议会址的查找工作一波三折。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曾发函给武汉大学李达、江西省委党校、中央文化部等多处，并到中央档案馆等单位查访，又访问了一些与中共四大有关的人物，留下了10多份书面调查或访问资料。然而，并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说法，“四大”会议会址仍下落不明。随着许多当事人相继去世，会址的查找更成为一个难题。

在“四大”会议会址的查找确认中，郑超麟是个关键人物（时任中宣部秘书，“四大”召开时由大会秘书长彭述之指定其担任记录）。他在《郑超麟回忆录》中回忆了“四大”的经过：“会场设在闸北广东街背后铁路边上一幢三层楼的弄堂房子，外地来的代表住宿其中；他们睡在三楼，二楼开会，布置成课堂形式，以便代表们收起文件而拿出英文教科书之类。”

1984年，郑超麟到虹口区进行实地辨认。走到川公路与东宝兴路之间的一段铁路时，他指着铁路轨道东边的新工房说：“就在这个地方。现在新工房的地点，可能就是当年的‘四大’的会场所所在地。”并说，当年会址北面还有一座教堂。随行人员指着印度锡克教堂问他是不是这座教堂，他遥望北面的教堂房屋说，具体样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座教堂。郑超麟还回忆，当年他除了负责会议记录外还担任向导工作，曾多次带领出席会议的同志前往会场，因此对当时的地点和路线印象较深。

后来，又经过多次的实地考察，终于确认上海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就是“四大”会址遗址。然而，由于原址房屋在抗战中被日军炸毁，虹口区于2006年在附近的多伦路215号，建起了一座“四大”史料陈列馆。2012年，位于上海四川北路公园内的中共四大纪念馆建成开馆，为上海新添一处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据《老年生活报》